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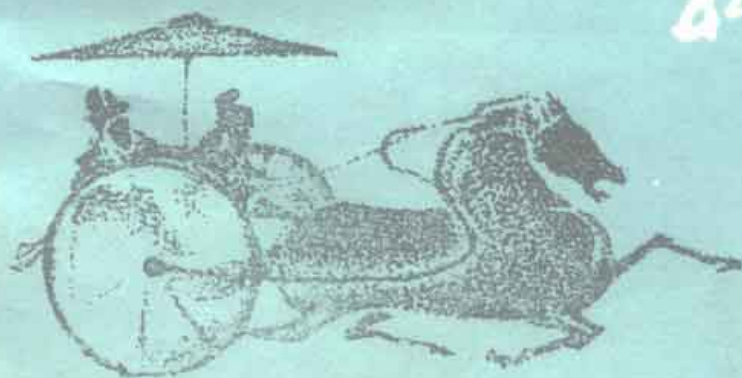
08.13

北京
文史資料

第四輯

9/

164000



北安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1年6月

内 部 发 行

北安文史资料（第四辑）

出版单位：政协北安市委委员会

承 印 厂：北安市报社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1.6 印数1—700

开本32·字数7万 印张3.5

黑新出图字（1991）170号



EA70/02

顾 问：李景阳

主 编：张洪江

编 辑：李世荣

责任编辑：苗丰涛

目 录

北安工作回忆	王维之 (1)
在支前担架队的战斗生活	李 惠 (34)
回忆在抗美援朝担架团的日子里	
.....	王 真 (46)
东北军政大学在北安	郎太岩 (68)
北安忆往	孙士学 (80)
忆原黑龙江省皮影戏队	孙士学 (99)
北安机关干部文化学校十七年	
.....	薛焕良 (120)
《北安报》创刊前后	范 文 (130)
忆伪满青少年义勇军和二井训练所	
.....	莫宝清(岩间典夫) 139)
北黑铁路始末	卢 斌 (161)
苍惠民之死	李 惠 (172)

北安工作回忆

王维之

笔者按：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是第一批由革命圣地延安来到黑龙江省，被省委、省政府派往北安县政府工作的。由1945年11月起至1948年3月，在北安县工作两年零五个月。这段工作时间虽不长，但留给我的印象却是很深刻的。

本文依据本人所存日记和回忆写了几个片断，用以反映当时在北安县工作过的同志的精神风貌（文中凡有具体月日的部分均据日记所载）。

一、行程八千余里

历时七十二天

1945年日本投降时，我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同学们在欢庆抗战胜利声中，根据党中央“力争东北”的战略方针，我随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干部团1000多人，于9月2日由延安出发，奔赴东北。我们这支队伍越走越大，路经绥德时增加了朝鲜义勇军，到晋西北兴县又增加了林

枫同志率领的独立营,共计 1500 多人,由两个步兵团护送,组成东北支队。

行至五寨县,干部团领导传达目前形势任务时讲,日伪军拒绝向我缴枪,要等国民党来接收。阎锡山、傅作义的队伍已到达晋中、晋北。蒋介石的部队正由美国协助,从海上和空中向东北赶运。党中央命令我们加速前进。

从延安出发时,中央党校副校长(当时毛主席兼校长)在送别我们的讲话中,就很有风趣地讲了“先到咸阳为君,后到咸阳为臣”的典故,要求我们抢在国民党前面到达东北。在行军中,干部团政委张秀山同志又几次传达中央指示,要我们星夜兼程,赶到国民党军队的前面进入东北。所以同学们一路不怕千辛万苦,奋力前进。为了减轻行军负担,我们进行了轻装,有的同学不得不把从延安带出来的珍贵的马列主义书籍寄存或送人,我把新做的“二毛”羊皮大衣也于中途处理了。

到达朔县时,同志们冒着淋漓的秋雨,踏着

泥泞的乡道，在大车道的泥浆中行走。走的人多了，泥浆有半尺深，走起路来就象带上了缠脚的软“脚镣”似的，特别费劲。试着转向大道边的高坎上走，又很滑，还不如在泥浆中趟。我们这支拖了十来里地长的队伍，走起路来东扭西歪，被雨淋得浑身直淌泥水。当时的形象，不时引起同志们相视苦笑。有一天过沙石峪，行军 150 里路，正值 10 月，塞北寒风刺骨，我的手脚都冻裂了。加上途中断了吃的东西，饿得向前迈一步都很困难。走至最后十几里时，疲劳得简直有难以移足前进之感。但当胜利到达沙河镇宿营地时，大家却又都喜笑颜开地边洗脚边畅谈行军中艰难的“洋相”故事，一路的辛劳全都置之脑后了。

我们的行军，由“不教胡马度阴山”的雁门关，到闻名中外的八路军抗日大战的战场平型关。由沿八达岭侧到三面环绕险峻多山，一面紧靠长城的四海口和古北口战场。我们看到，四海口山上布满日寇留下的碉堡，山下城内废墟累累，一片战场遗迹；古北口一带是抗日名将冯玉

祥和著名共产党人吉鸿昌将军浴血杀敌的抗日战场。蜿蜒高耸的长城，穿连在巍峨的群峰峻岭之上，显示了中华民族智慧勤劳，艰苦卓绝的伟大精神。我们饱览了长城内外许多古今战场的风光，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英勇奋斗的历史业绩而感到自豪。

过了平型关不久即进入了地域宽阔的新解放区。一种胜利的喜悦，使我们在平坦的公路上自豪地昂首阔步前进。看着迎面开来的大汽车飞驰而过，环视公路旁望不尽的又粗又高的电话线柱，层层密如织机径线似的电线，亦心情振奋，因为这些都是在老根据地见不到的景象。我们很快地进入了张家口地界。张家口是我们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同志们坐上了我们自己的火车到市中心站停下。

在张家口，肖克同志代表聂荣臻司令员向我们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和张家口市的情况，转达了党中央要求我们加速向东北前进的电报，并给我们发了棉衣、胶鞋和路费。我们又乘火车

继续前进。但火车只前行 200 里，因铁路被敌人破坏，不能继续乘坐了，又改步行。直到热河才又乘火车前进，经锦州，10 月 2 日抵达沈阳。我们这支队伍在市郊的鄆汾屯休息待命。三天后，彭真同志给我们做了“东北形势任务”的报告。在报告前他很风趣地说：“我在延安欢送你们，现在又在沈阳迎接你们。我是以‘三人小组’名义（三人小组由国共双方代表和美国代表组成，负责检查停战协定的执行），由延安乘美国的飞机来沈阳撤八路军的。”实际上是党中央借机派他来领导东北开辟工作的。苏联因和国民党有“东北政权交给国民党”的协议，所以苏联红军限制我军进入市区，已进去的要求我们撤出来。彭真同志说：“我们采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办法对付苏联红军。就是说我们撤一半留一半，造成似撤非撤的形势，让他想关门又关不上。”这也是让我们驻在沈阳郊区的原因。林彪也在这时由热河赶到沈阳，给我们作了军事形势任务报告。听完两个报告后，干部团即分赴东北各省

开辟工作。

我们派往黑龙江省的 100 多名干部，在范式人、赵德尊、杨英杰等同志领导下，于十月革命节(11 月 7 日)从沈阳乘火车出发，路经哈尔滨时，已是一片冰天雪地的北国风光了。在哈尔滨换车，休息一天，住在当时属我们领导的保安总部(现哈尔滨第三中学院内)。我们利用休息之机，游览了号称“东方莫斯科”的哈尔滨。看到许多欧式建筑，大教堂、石头马路，大街上车水马龙，颇觉新鲜。当时街上来往的俄国侨民很多。南岗秋林商店一带街头上，卖旧衣服的日本妇女也不少。昔日藏娇，今日沦为难民，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给无辜的日本人民带来的不幸。火车没煤烧就以木头、黄豆作燃料，车站道轨两旁洒满一层两寸多厚的新鲜黄豆，看了真令人可惜！

由哈尔滨出发前，给无枪的同志每人发了一支马枪，作自卫的武器。我们于 11 月 15 日由哈尔滨乘火车前往黑龙江省省会北安，途经绥

化时,就有部分同志下车分配了工作。当日午夜抵达北安,省军区王钧副司令员等到车站迎接我们。我们先到公安局室内休息,接着转至省政府院内住下。范式人等省委领导和一部分同志住在车站附近的银行,当日宣布黑龙江省委成立。领导连夜分配干部,三天三夜没休息。第三天我们到银行集合开大会,由范式人、赵德尊同志分别报告了当地情况和干部分配去向。第四天即分赴各县和各自岗位开辟工作。

我们从延安出发到达北安,跨越西北、华北、东北八个省,总计行程约8千里,历时72天,终于抢在国民党之前,胜利到达北安,为建立以北安为中心的黑龙江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孤身进政府 建立新政权

我开始是给省政府杨英杰副主席当秘书,协助廖仲符旅长由火车站抢运缴获敌伪的枪支

弹药。两天后，因北安县县长是原维持会会长，县政府与县委工作脱节。故省委、省政府快定派我去北安县政府任政务秘书、党组秘书，参加北安中心县委。

北安中心县委于我们到达的第二天（即 11 月 16 日）就成立起来。对外名义称政治部。北安中心县委负责领导北安县和指导德都、通北、克东三县工作。中心县委书记史梓铭兼三旅政委（三旅驻北安，旅长廖仲符），县委副书记王永昌兼县保安大队副政委（他是抗联时期北安地下党员，原绥滨县委书记）；组织部长李瑞山；民运部长张潭；宣传部长林楠；省会公安局撤消，改为北安县公安局，局长章林同志参加县委；后任北安电业局长的邱纯甫也参加县委，加上我共计八人（一般县委只有四、五人）。当时县委的中心任务是建立新政权，建军剿匪、反奸清特。

我进县政府时，正值国民党军突破山海关，我主力部队陆续从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撤出之际。北安地区，有很多地方上的国民

党特务、伪满警察和土匪勾结在一起，制造谣言、散发传单、连续放火、组织叛乱、暗杀等活动。开始向我方反扑。和我在延安中央党校同一支部的通北县政务秘书赵光同志，在通北火车站遭叛匪杀害；德都叛匪占据县城，县长边敬同志险些遇难。县大队副队长赵青山同志途中迷路，腿脚被冻坏，患破伤风医治无效，牺牲在北安军区医院。在我们来到北安之前，北安国民党部书记邓世儒和邱国柱已开始积极发展国民党党员，并挂出了“国民党北安区党部”的牌子。我们接收之后，他们转入秘密活动，搜集我党、政、军情报，组织土匪武装，企图搞暗杀活动。县公安局从北安县原维持会警察局副局长高致远（日本特务）家搜出的一份暗杀我干部的名单中有陈大凡、王化成、史梓铭、王维之和章林。我就是在这种严峻的斗争形势下只身一人进入北安县政府，开辟工作的。

我们接收的北安县政府，是在原维持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头头全是伪官吏，干部全属伪

职员，上下无一可靠的人提供情况。所以当时真有孤身入虎穴之感，时刻提防遭敌人暗算，他们准备把我安排在县政府办公室内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文具库住。因这个小屋除库门外，只有一个不大的四方小窗户，万一敌人来了好对付，再说还有值夜班的人作伴。夜里把手枪、匣枪、马枪、刺刀几大件都放在身边，睡觉前设想好敌人如果打进来的时候，如何与之拼搏的各种方案。直到1946年初政府有了我们自己的警卫排，才与政府的几位工作人员住进县政府后院宿舍。

打碎旧的政权机器，建设新政权是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但又不能操之过急。一则有苏联红军的制约，因苏联红军过去靠维持会维持其供应；二则我们又一时无入代替，所以开始县政府只好在县委领导下利用维持会的底子开展我们的工作。1946年5月31日我和史梓铭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讨论落实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同年

10月参加省政府召开的第一次县长会议,明确了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后方治安,支援前线和发展生产。当时虽以土改支前为中心,但时刻注意发展农业生产问题。县委书记,县长联席会议,选在春耕结束,铲完头遍地,保证不荒地的前提下召开;县长联席会也是在秋收大忙之后召开。清剿土匪与镇压汉奸特务工作主要由县大队和公安局负责。各级政府主要负责配合发动群众、整顿社会治安、募兵扩军、组织军衣、军鞋、担架等支前工作。当时物资供应十分困难,除用大豆、谷子从苏联换回一些布匹之外,主要是靠自己发动群众组织生产自给。县政府成立了生产科,搞加工生产,开展贸易活动。县政府机关和县大队、公安局等主要单位都搞一些自给性的种菜和加工生产,作为单位的伙食补充。县政府拨给县大队一个油坊和一个豆腐坊,解决战士们吃油,吃豆腐的困难。

在县委领导下,我在政府边工作,边考察了解政府人员政治历史面貌和工作表现,及时选

拔干部,清理改造调整、充实政府职能机构。县长张希玉系伪满县公署行政科长,属汉奸线内。日寇投降后,他摇身一变成为维持会长。他善于看风使舵,对苏联红军维持的不错,得到北安红军司令官阿里耶夫少校的赏识,坚持让他当县长。我到县政府工作时,张也象伪满汉奸县长对待日本人副县长一样,表面上一切听我们的意见,但暗里和国民党勾结,阴谋搞叛乱,所以在反奸清算斗争一开始就被我撤职,由民主人士刘铁樵继任县长。刘为东北早期刘少奇在东北工作时的地下党员刘伯刚之弟。刘伯刚虽脱党一段,但东北解放后恢复党的关系(重新入党),和刘铁樵一起积极为党工作。刘铁樵系商人出身,为北安制材厂经理(当县长后委托别人代经理)。解放后在北安为我招募上千人的队伍,我们来后,军队交给军区。刘为人忠厚朴实,没有一般商人油头滑脑习气,政治上拥护,支持共产党、八路军,在当时政局动乱不定的严峻形势下,一心为革命奔波不动摇,支持儿女参加革